

東漢碑額書法

藝術研究

陳星平◎著



東漢碑額書法藝術研究

藝林選刊
陳星平著

文津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東漢碑額書法藝術研究 / 陳星平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12. 08

面 ; 公分. -- (藝林選刊)

ISBN 978-957-668-966-6(平裝)

1. 篆書 2. 隸書 3. 碑碣 4. 東漢

942.12

101016394

· 藝 林 選 刊 ·

東漢碑額書法藝術研究

著 作 者 : 陳 星 平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址 : 台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 話 : (02)23636464 傳 真 : (02)23635439

郵政劃撥 : 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 記 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25 開本 (15×21 公分) 350 頁 印數 500 本

初版 : 2012 年 8 月一刷 ISBN 978-957-668-966-6

定價 : 新台幣 420 元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碑刻概述.....	1
第二節 東漢碑刻研究概述.....	12
第三節 碑額的定義與重要性.....	35
第二章 東漢碑額綜述.....	44
第一節 東漢立碑盛行之緣由.....	44
第二節 東漢碑額保存狀況.....	52
第三節 東漢碑額題尊習慣.....	65
第三章 東漢篆額書法風格探討.....	74
第一節 東漢篆額種類型式.....	74
第二節 東漢篆額書法特色.....	87
第四章 東漢篆額字形的特色.....	110
第一節 東漢篆額與《說文》小篆體的比較.....	111
第二節 東漢篆額與漢碑文篆書體的比較.....	122
第三節 東漢篆額與漢印篆書體的比較.....	128
第四節 東漢篆額與漢金文篆書體的比較.....	142
第五節 東漢篆額與簡帛篆書體的比較.....	150
第六節 東漢篆額字形特色.....	162
第五章 東漢隸額的書法風格.....	170
第一節 東漢隸額書法種類型式.....	170

第二節 東漢隸額書法風格特色探討.....	180
第六章 東漢隸額的字形特色.....	196
第一節 東漢隸額與漢碑文隸書體的比較.....	200
第二節 東漢隸額與簡帛隸書體的比較.....	214
第三節 東漢隸額字形特色.....	228
第七章 結論.....	231
第一節 東漢碑額書法的藝術價值及影響.....	231
第二節 東漢碑額對後代碑制的影響.....	237
參考書目.....	246
附錄	258
附錄 1 東漢篆書碑額資料表.....	258
附錄 2 東漢隸書碑額資料表.....	274
附錄 3 東漢篆額字樣總表.....	284
附錄 4 東漢隸額字樣總表.....	295
附錄 5 東漢篆額與其他篆書字體比較總表.....	304
附錄 6 東漢隸額與其他隸書字體比較總表.....	33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碑刻概述

書法藝術與歷代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哲學、各類藝術的發展以及社會習俗等等，皆有著緊密的關聯與影響。中國書法之藝術風格變化繽紛，所謂「漢人尚氣、魏晉尚韻、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趣、清人尚樸」¹之說，即反應出不同時代的書法藝術風格與書法美學思想的發展迭變，而這些書法藝術之發展趨勢則取決於時代和社會的發展。

書法藝術發展中，碑學的發展較帖學後起。「碑學」指的是在書法上推崇碑刻書法的流派，它是與「帖學」相對的一個概念。而以王羲之書風為核心的帖學傳統發軔於魏晉之際，在唐初蔚然成為正統而牢不可破。直到清代書家紛紛取法古拙質樸的古代金石鼎銘文字，特別崇尚「金石味」，書法品味才發生重要變化，並且在 18 世紀發展成碑學傳統，形成碑學與帖學並重的局面。因此，在過去的 300 年中，碑學對中國書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對中國書法史的重要性，相當於印象派繪畫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地位。雖然治中國書法史的學者均承認碑學的重要性，但相關的系統研究卻寥若晨星。而學術界關於這個課題的成果主要有廖新田《清代碑學書法研究》一書，和為數不多的一些散見於書刊中的論文或章節，而在西方藝術史界，雷德侯的《清代的篆書》是唯一詳細研究碑學的西

¹ 參考〈中國書法網〉網址：<http://www.zgsfw.net/Get/sxly/122006887.htm>

方著作。²

在碑學研究中，對於碑額的研究更是稀少，除未見有完整系列之專題研究外，大多數僅止於在論述碑文時簡單說明碑額內文和風格簡述而已；再加上碑刻自身的特點，在以往主要依據碑文拓本而流傳，但對碑額文字則予以輕忽，以至於在拓碑時往往忽略碑額的存在，導致多見碑文拓本而不見碑額拓片；隨著時間推移，有的佚散、有的損毀、有的殘缺，有的則可能被竄改而面目全非，導致碑額資料散亂而不集中。而迄今仍未見全面性的碑額史料探討及其價值與內涵的探討，這對於碑刻書法之研究乃是美中不足之事。

今日我們所稱的「碑」，其形成與發展其實有著相當長遠的歷史歷程。趙超認為：

隨著生產工具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充分利用石料做建築材料，進而在石塊上雕刻各種圖像，刻寫銘文。西元前約 8000 至 7000 年的西亞耶利哥遺址中已經出現了石築的望樓和城樓，西元前 3500 至前 3100 年的西亞烏魯克文化出現了刻有文字的石板和雕有圖像的石碑，西元前 3100 至前 2686 年的古埃及早王朝時代有了石碑和石建築，西元前 2686 至前 2181 年的古王國時代便有了大量的石質神廟、金字塔和宏偉的方尖碑。這些都展現了石刻歷史的源遠流長，幾乎與人類的文明史一樣古老。³

由上文可知，樹立碑石是在西亞文化、古埃及等古代文明國家中常見的現象，且遠遠早於中國，因此也勢必產生廣泛的影響。

趙超又說：西漢自武帝始，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交流

² 參見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06.4 北京第 1 版、2006.7 北京第 2 次印刷），頁 2。

³ 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版），引言，頁 5。

日益增多，在《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中記載漢朝與許多西亞、中亞諸多國家相關交流的事蹟。在漢以前的出土器物中，很少見到外形與漢碑相似的。但漢碑的圭首、圓首、上部以圖案裝飾、表面精工磨製等形制特點，卻可以在遠早於中國漢代的北非、西亞乃至中亞古文化碑刻及遺物中可以找到源頭。因此，趙超認為，東漢石碑的外形，很有可能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而形成的。⁴關於西方影響論這樣的觀點，仍有待繼續發掘出土史料予以論證。

但整體而言，中國碑刻的歷史雖然不及西亞、北非等地那麼悠久，但中國古代多以文字銘文為主，以銘刻金石作為一種文獻記載的手段起源很早。早在殷商時代就已經有刻石記事的活動，1935年殷墟侯家莊 1003 號墓中出土的石刻上有文字 2 行 12 字，而聞名於世的秦石鼓文則是刻石記事頗為普遍的見證。石刻文獻的價值歷來為學者所重視，司馬遷著《史記》已將石刻文獻納入其史料範圍。但石刻文獻的價值不僅在於史學，還在於文字學、經學、文學、刻技、文獻考校、宗教、書法等許多領域。⁵這些以石質材料為書寫載體的銘刻文字就稱為碑刻，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碑刻文獻的發展在東漢，而高峰則出現在唐代，並且延續到現在，人們用各種方式製作了大量碑刻。各時代的碑刻文獻的繼承和發展，狀況和特徵應該清理。⁶

在中國，「碑」這個名詞在先秦文獻中已經出現，先秦當時所稱之「碑」，都是為了現實生活所需而設置，有實際用途。用途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其一，測量日影，為宮中之碑。也就是作為「識日景、引陰

⁴ 參見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頁 12~13。

⁵ 周少川《碑刻文獻學通論序》，見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

⁶ 關於中國碑刻的文獻價值，可參見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頁 22。

陽」之用，測日影的日晷。《儀禮·聘禮》言：

鉦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

鄭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⁷

其二，栓繫牲口，為廟中之碑。是作為「引物」、「麗牲」之用，亦即豎於廟門用來繫牲口的柱子。古代宗廟祭祀，牲口是最重要的祭品，故在宗廟前面豎立石頭，上面穿上孔，以便栓繫準備宰殺的牛羊等犧牲。《禮記·祭義》言：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

孔穎達疏：「麗，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編貫碑中，君從此待之也。」⁸

《儀禮·聘禮》鄭注：「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⁹

其三，喪葬下棺，為墳墓之碑。在土葬下棺時，在墓穴的四角立上木板，上端中間鑿一個圓孔，繫棺材的大繩穿過木板上的圓孔，繩子被緊緊扣住，再把棺材慢慢放下去；亦即豎於槨四角以引棺入墓的豎木。如《禮記·檀弓下》記載：

公室視豐碑。鄭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絆繞，天子六絆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¹⁰

⁷ 《十三經注疏 4·儀禮》(臺北：藝文印書館)，卷 21，頁 255。

⁸ 《十三經注疏 5·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卷 47，頁 812。

⁹ 《十三經注疏 4·儀禮》，卷 21，頁 255。

¹⁰ 《十三經注疏 5·禮記》，卷 10，頁 188。另，《十三經注疏 2·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卷 15，頁 502。

漢·劉熙《釋名·釋典藝》中也說：

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¹¹

由上可知，「碑」原指的是一種下棺的木質轆轤基架。在 1986 年陝西鳳翔秦公大墓中，就曾發現四座無字豎木的巨碑實物，以及當時引棺入墓的轆轤基座(高 1.7~2 米，直徑 0.4 米的木柱)¹²。因此，馬衡認為漢碑「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量者，乃墓碑施鹿盧之遺制」¹³。

上述這些均指沒有文字的豎石或豎木，與日後石刻之「碑」有別。今日所稱之墓碑，無疑應源於墳墓用的「豐碑」。這種「豐碑」最初「斲大木為之」，可能因容易朽爛，而後改為石製。在 1996 年在河南省新鄭市黃帝故里西側 600 米處的戰國韓國宗廟遺址，發現一塊石質「無字碑」。整體成圭形，下半部中間有一穿孔，質地是灰色砂岩。全長 3.25 米，寬 0.45 米，厚 0.25 米。此碑是戰國時期韓國太廟所立之碑，這比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漢代石碑還要早數百年，雖被譽為「中華第一碑」¹⁴，但仍是無文字的豎石。

也就是說，周代應是中國墓碑的原始期，但此時墓碑僅作為入葬時下棺用的工具，稱為「豐碑」，其上並無銘文，但其豎石、帶穿的基本形制已經出現，現存紹興大禹陵的「窆石」，范邦瑾認為應是先秦遺制。¹⁵

¹¹ 漢·劉熙《釋名·卷 6·釋典藝第 20》，百部叢書集成之 84《小學彙函》(第一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¹² 見仲威《碑學 10 講》(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6 第一版)。

¹³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臺北：明文書局，1981.9 初版)，〈中國金石學概要下〉卷 2，頁 69。

¹⁴ 參見仲威《碑學 10 講》，頁 2~3。

¹⁵ 范邦瑾《東漢墓碑溯源》，收於《漢碑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0)，頁 50、62。其云：「現存紹興大禹陵的『窆石』傳為禹下葬時所用，當其遺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到處勒石紀功，亦不稱碑而稱「刻石」¹⁶。西漢時期用於墳前的刻石也不稱碑，因此，我們可以說從戰國到西漢是墓碑的醞釀期，此時各類墓前題銘材料及記功刻石相繼出現，但尚未出現在有穿孔的豎石上刻字題銘這一形式和自銘為「碑」的刻石。因此，碑的形制在西漢中期以前並無固定形狀，在漢武帝之後才有了雛形。¹⁷

「碑」的演進逐漸由下棺的木質輓轡基架變成無文字的豎石。由於這種醒目的豎石能有標識墓葬方位的作用，大約到了西漢，人們開始在下葬碑的石板上刻寫文字，簡要記述墓主的姓名、官職、籍貫、卒葬年月等文字內容，並豎立於墓前神道，以示永久標誌，人稱「墓表」。這種葬具的出現，是喪葬習俗、制度的一種重大改變。現在見到的實物就是《庶孝禹刻石》，或題名《庶孝禹闕銘》，就文字內容而言，實則屬於墓表，是後世墓碑的雛形。¹⁸

之後，臣子為追述君父的功美，才書刻大量褒彰業績的銘文於墓表之上，從而產生了今日所稱的「碑」。漢·劉熙《釋名·釋典藝》中就說：

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其輓轡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兼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¹⁹

制。」「窆石傳為夏禹之物固甚可疑，然據上刻東漢永建元年(126 年)等歷代題銘，說它是先秦遺物當是可信的。」

¹⁶ 詳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7 初版)。

¹⁷ 王思禮、賴非〈漢碑的源流、分期和碑形釋義〉，收於《書法》1988 年第 4 期，頁 10~15。另見《漢碑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0)，頁 24~36。

¹⁸ 參考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頁 30。

¹⁹ 漢·劉熙《釋名·卷 6·釋典藝第 20》，百部叢書集成之 84《小學彙函》(第一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這段話充分說明了「碑」原本為豎於槨四角以引棺入墓之用，臣子追述君父之功，書刻於碑之上；後人沿用此法，並兼豎碑於道旁明顯之處，故稱之為「碑」。至此，刻有文字的石板才稱「碑」，沒有銘刻文字的石板則被排斥在「碑」的範圍之外。因此，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就曾說：

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石碑碣，卒不可得。²⁰

立石書刻文字並有固定形制的「碑」，一直到東漢才產生。也就是說，東漢墓碑的形成是經過不同歷史時期逐漸演化發展的結果。

王思禮、賴非〈漢碑的源流、分期和碑形釋義〉中將碑石形制發展分為三期：第一期為「無固定形狀期」（秦至西漢武帝時），第二期為「雛型期」（西漢武帝後—東漢初），第三期為「定型期」（東漢中晚期），並指出至〈王孝淵碑〉、〈景君碑〉時碑已定型，至桓、靈二朝才達到鼎盛階段。²¹

東漢初年應是墓碑的轉化期，例如：東漢和帝永元 4 年(92 年)〈袁安碑〉出土時首部已殘，但有穿，所以是現存最早帶穿孔的豎石上刻字的碑石，其形制已與後來的墓碑沒有甚麼區別。但其碑文雖然有墓主的履歷、卒葬年月，卻沒有頌辭。因此，從功能上而言，未具墓碑的歌功頌德的作用，亦可推論當時的碑從外觀形制上看已基本成熟定型，只是碑文尚未定型。²²類似的還有東漢安帝元初

²⁰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 4·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塚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見《石刻史料新編 24 目錄題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社），頁 17869。

²¹ 王思禮、賴非〈漢碑的源流、分期和碑形釋義〉，收於《漢碑研究》，頁 24~36。

²² 〈袁安碑〉石高 1.53 米，寬 0.74 米，出土時首部已殘，且有穿。其形制已與

4年(117年)的〈袁敞碑〉。

第一塊自銘為「碑」的墓石是東漢順帝永建3年(128年)刻立的〈王孝淵碑〉²³，其末尾刻有「永建三年六月始旬丁未造此石碑」²⁴，其碑文有墓主的卒葬日期、官職，而且還有頌辭，所以，徐玉立認為此時東漢墓碑的碑文已經成熟，不再是簡單地刻寫墓主的姓名，僅作標識墓域的作用；碑刻的內容已成為一種新體裁的文章，有了歌功頌德的內容，所以他認為東漢墓碑在此時已成熟定型。²⁵而在〈北海相景君碑〉(漢安2年，143年)和〈武斑碑〉(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的出現，則標誌著墓碑大量湧現的到來。²⁶

但另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范邦瑾則認為「王孝淵碑」出土於磚券墓中，且正面向墓室，是作為護壁用的，其形制也與東漢普遍盛行的立在墓前帶有穿、暈的碑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種特例。因此，范邦瑾認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真正是在墓前帶有穿孔的豎石上刻字，又自銘為「碑」並有墓主生平事蹟和頌辭，具有標誌墓地和歌功頌德作用的，目前所見恐怕要以立於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的〈武斑碑〉為最早了；也就是說范邦瑾認為〈武斑碑〉才是「標誌著墓

後來的墓碑沒有甚麼區別。只是因為其上部殘損，還無法知道它是圭首、圓首而已。見徐玉立〈漢碑說略〉，收於《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8第一版)，頁18。

²³ 1966年於四川省成都郫縣犀浦二門橋出土「王孝淵碑」，高2.35米，寬0.96米，碑文13行，刻於東漢永建3年(128年)6月，且自名為碑，是目前所能見到自名為「碑」的最早實物，見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頁67~71。

另見范邦瑾〈東漢墓碑溯源〉(收於《漢碑研究》，頁62)注云：「在〈王孝淵碑〉前有〈戚伯著碑〉和〈李昭碑〉雖亦自銘為碑，但〈戚伯著碑〉僅書『大歲丁亥』無確切建年；〈李昭碑〉據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四和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一疑為偽作，今二碑原石均佚，難以查證，故不取。」

²⁴ 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頁8。

²⁵ 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頁18~19。

²⁶ 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頁18~19。

碑已完成其不斷演進發展的過程。這時的墓碑從形制、內容文體到刻立目的等均已基本定型」²⁷。

前三者說法對於東漢墓碑成熟定型的時間點都認為在東漢中、後期，但具體表述上略有不同；主要差異性在於對〈王孝淵碑〉刻立目的與形制的認知差異；徐玉立認為其被改用在一座晉代墓葬中作護壁使用，但與王思禮、賴非均認為已具碑的成熟型式；但范邦瑾認為其用作護壁，且形制也與東漢普遍盛行的立在墓前帶有穿、量的碑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種特例。范邦瑾認為須從形制、內容文體到刻立目的三項要點去界定碑的成熟與定型化。

碑的形體從墓葬下棺之用到成為特定的內容文體和表彰德性的刻立目的，在史籍上可找到相關佐證，而名稱亦隨時間而略有不同，從這些事件的前後時間可以找到變化的軌跡。《後漢書》上對於彰顯德性的刻石有所記載，例如《後漢書》卷 39 記載了淳于恭受刻石表彰的情事，如下：

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亨，恭請代，得俱免。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²⁸

雖不能認定這種「刻石表閭」就是墓前刻石，但是這種彰顯德行的刻石，在章帝(即肅宗)建初元年(西元 76 年)時，仍尚未稱碑。

其次，《後漢書》卷 84〈列女傳第 74〉也記載孝女叔先雄為父自沉的事跡，後來官府立碑表揚的始末。內容如下：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

²⁷ 范邦瑾〈東漢墓碑溯源〉，收於《漢碑研究》，頁 60~62。

²⁸ 《新校本後漢書並附編十三種二》(臺北：鼎文書局)，卷 39〈劉、趙、淳于、劉、周、趙列傳第 29〉，頁 1301。

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屍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²⁹

從上述內文「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中，我們可以得知，在順帝永建初年時，這種為彰顯德行的刻石已稱「碑」，最晚不會超過永建7年(131年)。

再者，《後漢書》卷23記載順帝為竇章女豎碑頌德寫辭之事。如下：

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遷屯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³⁰

也就是說，至少到了順帝永和5年(140年)，這種為彰顯德行的刻石除已稱「碑」外，而且「辭」也有專人撰寫了。

另外，《後漢書》卷52記載崔瑗擅長文辭，包括碑文。如下：

漢安初，……病卒，年六十六。……瑗高於文辭，尤善為

²⁹ 《新校本後漢書》，卷84〈列女傳第74〉，頁2799~2800。

³⁰ 《新校本後漢書》，卷23〈竇融列傳第13〉，頁822。

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凡五十七篇。³¹

崔瑗卒於順帝漢安 2 年(143 年)，徐玉立因此推測碑文成為獨立文體的時間點在於順帝之初或安帝之末已經成熟。他說：

順帝在位十八年，正是崔瑗的人生後期，如果說他所著的「碑」都是在五十歲以後寫成的，那麼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碑」在順帝之初或在安帝之末已經成熟。因為它已經有別於其他文學形式而存在了。³²

「碑」既在順帝漢安時期前已成為專有文體，代表其形式已相當成熟，其時間點比范邦瑾所主張的桓帝建和元年(147 年)的〈武斑碑〉再早一些。

因此，透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推測碑應是在順帝時期成熟定型的；也就是說，此時東漢墓碑已完成了從原始的「下棺以綵繞」，到「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的轉化，象徵著墓碑的性質與目的已經有根本上的轉變，東漢墓碑形制至此時發展成熟。

更由於厚葬豎碑立傳之風盛行，上自帝王，下至庶民，莫不豎碑，至桓、靈之時，達到極盛，數量相當可觀，劉勰《文心雕龍》云：「後漢以來，碑碣雲起。」³³足見東漢碑碣之盛。

直到魏晉之際，魏武帝³⁴、晉武帝³⁵出於遏制侈靡的社會風氣和

³¹ 《新校本後漢書》，卷 52〈崔駰列傳第 42〉，頁 1724。

³² 徐玉立〈漢碑說略〉，《漢碑全集》，頁 19。

³³ 劉勰《文心雕龍》，卷 3〈誄碑〉第 12。

³⁴ 建安 10 年(205 年)，曹操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其曰：「妄媚死者，增長虛偽，而浪費資財，為害甚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卷 1：「(建安)十年春正月，……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臺北：鼎文書局)，頁 27。

³⁵ 沈約《新校本宋書》，卷 15 志第 5〈禮〉2：「晉武帝司馬炎於咸寧四年(278

維護自身統治，曾先後詔令廢棄厚葬，嚴禁豎碑的行政命令。此舉雖使盛行一時的墓碑從地面上消失，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民間喪葬習俗，反而成為促使墓碑向墓誌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型因素³⁶，可說是對於後世墓碑的發展演變產生極大作用。

東漢立碑風氣盛行，導致部分立碑者為表彰死者生前事蹟，不免要假託高門，誇稱德業，使碑文浮誇不實而為人所詬病；但也因當時立碑風氣之普及，使得這些豐富的史料正足以成為研究當時文化社會相關現象的重要線索，至今保存下來的石碑或拓本，其碑刻書體也成為瞭解東漢書法藝術的重要載體，彌足珍貴，為研究漢字的演變和漢代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真實史料。

第二節 東漢碑刻研究概述

中國的石刻文字起源較早，現存的石刻文字實物有戰國、秦國的刻石，兩漢承接前代的刻石傳統而發展成熟，因此，兩漢石刻文字在金石學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東漢是碑刻的成熟時期，數量相當豐富，其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視。

回顧歷代碑刻研究情況，最早著錄漢代石刻者，始於後魏·酈道元《水經注》³⁷，雖非專為漢碑而著，但所載錄漢碑條目卻成為最

年)下詔禁碑，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臺北：鼎文書局，1975），頁407。

³⁶ 1973年於山東高密縣發現熹平4年(175年)孫仲引墓誌，因此石發現於墓道之內，所以是墓誌。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通墓誌，也證明墓誌在東漢中期就已經出現了。見于書亭、李儲森〈山東高密新發現漢孫仲引墓誌〉，《書法》1991年第4期，頁42。另參見丁瑞茂《漢鮮于璜碑研究—從鮮于璜碑看漢碑碑形、篆額書風及畫像紋飾》（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31。

³⁷ 見宋·洪適《隸釋》卷20，頁195~211。朱劍心《金石學》（臺北：臺灣商務